

家庭关怀度与中小學生校園欺凌受害的關係： 社交焦慮和心理彈性的鏈式中介作用

蔣怡丹¹ 王婧怡¹ 張麗²

1. 湖南科技大學心理健康教育中心，湘潭；

2. 常德市武陵區第六小學，常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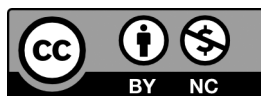
摘 要 | 為探討家庭關懷度與中小學生校園欺凌受害的關係，以及社交焦慮和心理彈性在其中的中介作用，本研究採用家庭關懷度指數量表、特拉華欺凌受害量表（學生卷）、兒童社交焦慮量表，以及青少年心理彈性量表對湖南省內546名中小學生進行問卷調查。結果發現：（1）家庭關懷度、社交焦慮、心理彈性與中小學生校園欺凌受害之間兩兩顯著相關，且家庭關懷度顯著負向預測中小學生校園欺凌受害。（2）社交焦慮與心理彈性在家庭關懷度與中小學生校園欺凌受害之間起顯著的中介作用。具體為三條中介路徑：一是社交焦慮的單獨中介作用；二是心理彈性的單獨中介作用；三是社交焦慮和心理彈性的鏈式中介作用。本研究豐富了校園欺凌受害領域的研究成果，對預防中小學生校園欺凌具有啟示意義。

關鍵詞 | 校園欺凌受害；家庭關懷度；社交焦慮；心理彈性；中小學生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1 引言

校園欺凌受害（School Bullying Victimization）指個體長時間或反復受到一個或幾個同伴欺凌或傷害的現象，通常具有力量不均衡、重復性和傷害意圖的特點（Smith P K & Myron-Wilson R, 1998）。近年來，校園欺凌問題呈現高發趨勢，成為全球兒童青少年面臨的重要社會

風險之一。UNESCO（2019）發布的多國報告顯示，約32%的學生曾遭受欺凌事件（Attawell K, 2019）。我國安徽、中西部地區中小學生校園欺凌報告率均在20%以上（唐程夢等, 2022；王武寬等, 2021）。大量研究表明，欺凌受害者會更多地報告焦慮、抑鬱等負面心理狀態及頭疼、睡眠困難等生理症狀（Chai L et al., 2020；Gini G & Pozzoli T, 2013），且此類影響可能延續至成年

基金項目：湘潭市社科聯2025年度“領導出題·專家答題”社科規劃課題（2025064）；2025年湖南科技大學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課題（10）。

通訊作者：蔣怡丹，湖南科技大學助教，研究方向：心理健康教育。

文章引用：蔣怡丹, 王婧怡, 張麗. (2025). 家庭關懷度與中小學生校園欺凌受害的關係：社交焦慮和心理彈性的鏈式中介作用. *中國心理學前沿*, 7(8), 1008–1014.

<https://doi.org/10.35534/pc.0708163>

期，損害其心理健康與社會功能（Copeland W E et al., 2013; Menesini E & Salmivalli C., 2017）。因此，了解校園欺凌受害的成因及影響機制，對於有效地預防與干預具有重要意義。

以往研究表明，在眾多影響校園欺凌受害的因素中，家庭始終是主要因素之一（郝義彬等，2022）。生態系統理論指出，個體發展嵌套於多個層級的環境系統之中，家庭作為微观系統，對個體的發展有著直接、深遠的影響。家庭關懷度是反映家庭功能的一種度量指標，指個體對其所處家庭功能狀況的主觀滿意程度（Beavers W R & Voeller M N., 1983）。家庭關懷度高意味著個體自身能感受到家庭更多的情感支持與幫助（Wu K et al., 2022），其心理健康水平越高（潘蘭，王滔，2025）。相反，家庭功能受損，則會產生一系列的情緒行為等適應性問題（Ma X et al., 2013），也更易遭受校園欺凌（林進材，2017）。

社交焦慮是個體對人際交往環境所產生的強烈擔憂、緊張、恐懼的情緒反應（Schlenker B R & Leary M R., 1982）。青春期中處於社會交往能力快速發展的階段，社交焦慮對其心理健康與人際適應產生深遠影響（侯娟等，2021）。已有研究表明，充滿關愛與支持的家庭環境能促使個體形成積極的自我認知和安全感，從而減少社交中的焦慮體驗（黃雪梅，汪勇，2006）；相反，忽視、控制或過度干預的家庭教養方式則會增加其在互動場景中的不安與恐懼（李潔等，2021）。此外，社交焦慮不僅是情緒困擾的表現，也與社會認知密不可分，社交焦慮個體傾向於對社會信息進行負向加工和消極解釋，進一步增加個體卷入校園欺凌的風險（彭玉佳等，2025）。

心理彈性是個體面對生活逆境、創傷或其他生活重大壓力時的良好適應，指面對生活壓力和挫折的“反彈能力”（Herrman H et al., 2011）。它是維護青少年心理健康、預防行為問題的重要心理資源。研究表明，具備良好功能的家庭環境有助於個體形成自信、樂觀的性格特質，從而提升其面對困難時的調節能力與問題解決能力，增強心理彈性（Cohen S & Wills T A., 1985; 席居哲等，2015），從而更好地面對和處理校園欺凌問題（張家銘，2024）。反之，家庭支持的缺失會限制個體應對壓力的資源積累，削弱其彈性水平（游雅媛等，2017），使其更容易在校園情境中遭遇不良適應或受欺凌（李海奎，張文新，2006）。

另外，社交焦慮與心理彈性密切相關。根據美國學者康普弗（Kumpfer）提出的彈性框架模型（resiliency framework model, RFM），較高的社交焦慮和抑鬱降低了個體的心理彈性水平（Kumpfer K L., 1999）。這與大多數研究結果一致，如范春艷等人在對上海市初中生的研究中发现，社交焦慮與心理彈性呈現顯著的負相關。社交焦慮的初中生較少與他人建立密切關係，致使他們獲

得的支持較少，這可能導致較低的心理彈性（范春艷，汪泉，2024）。因此，本研究選取社交焦慮、心理彈性作為中介因素，進一步其家庭關懷度與校園欺凌受害之間的關係。

2 研究方法

2.1 被試

採用隨機整群抽樣法，在湖南省湘潭市、常德市抽取小學3~7年級學生為被試，以班級為單位進行集體施測，測試結束時問卷統一回收。共發放問卷577份，剔除被試年齡小於9歲、作答不完整、回答一致，以及處於正負三個標準差之外的無效問卷後，回收有效問卷548份，有效率為94.97%。其中，男生269人，占比49.09%；女生279人，占比50.91%。被試的年齡在8~14歲之間，平均年齡為 11.11 ± 1.45 歲。

2.2 研究工具

2.2.1 特拉華欺凌受害量表

採用謝家樹等修訂的特拉華校園欺負受害量表（學生卷）（謝家樹等，2018），該量表共有17個條目，分為言語欺負、身體欺負、關係欺負和網絡欺負四個部分，其中13題作為篩查題目，不計入數據分析。貝爾（Bear）在施測時發現相比其他三類，網絡欺負頻率較低且往往發生在校外，與校園環境和氛圍的關係相對較弱，而且不同研究者對於它與其他維度是否屬於相同結構存在歧義（Bear G G et al., 2011）。考慮到本研究被試年齡較小，網絡欺凌的接觸頻率和識別能力有限，未將網絡欺凌維度納入分析範圍。量表採用6點計分“1”表示“從來沒有”，“2”表示“偶爾”，“3”表示“一個月一兩次”，“4”表示“一個星期一次”，“5”表示“一個星期多次”，“6”表示“每天都有”，得分越高說明被欺凌現象越嚴重。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 α 係數為0.83。

2.2.2 家庭關懷度指數量表

採用斯米尔克斯坦（Smilkstein）編制的家庭關懷度指數量表（張作記，2005），共5個條目，每個條目分別從適應（adaptation, A）、共處（partnership, P）、成長（growth, G）、情感（affection, A）、親密（resolve, R）5個層面對家庭功能進行主觀滿意度評價。採用3點計分，5個條目的得分相加即表示家庭功能程度，得分越高，表明家庭功能越好。其中，0~3分為家庭功能嚴重障礙，4~6分為家庭功能中度障礙，7~10分為家庭功能良好。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 α 係數為0.88。

2.2.3 兒童社交焦慮量表

採用拉格雷卡（La Greca A M et al., 1988）編制的兒童社交焦慮量表，共10個條目，包括害怕否定評價、社交回避和苦惱等維度。10個條目的得分相加即為社

交焦慮總分。採用5點計分，得分越高，表明兒童的社交焦慮程度越高。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 α 係數為0.87。

2.2.4 青少年心理彈性量表

採用胡月琴等編制的青少年心理彈性量表（胡月琴，甘怡群，2008），共27個條目，包括個人力和支持力兩個維度。其中，個人力維度包括目標專注、情緒控制和積極認知3個因子，支持力維度包括家庭支持和人際協助2個因子。該量表採用5點計分，從1~5表示“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說明心理彈性越高。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 α 係數為0.86。

2.3 數據處理與分析

採用SPSS 25.0及Process宏程序對數據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共同方法偏差檢驗、相關分析和中介模型效應檢驗。

3 結果與分析

3.1 共同方法偏差檢驗

採用 Harman 單因素檢驗方法對數據進行共同方法偏差檢驗。結果顯示，第一個因子解釋率為20.10%，遠低於40%的臨界標準（熊紅星 等，2012），說明本研究數據不存在嚴重的共同方法偏差現象。

3.2 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及相關分析

表1列出了各變量的平均數、標準差及相關係數。相關分析顯示，家庭關懷度與社交焦慮、校園欺凌受害呈顯著負相關，與心理彈性呈顯著正相關；社交焦慮與心理彈性呈顯著負相關，與校園欺凌受害呈正相關；心理彈性與校園欺凌受害呈顯著負相關。此外，性別與家庭關懷度、社交焦慮呈顯著性相關，因而在後續分析時將其作為控制變量處理。

表 1 各變量的均值、標準差以及相關係數

Table 1 The means, standard deviations,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of the variables

變量	<i>M</i>	<i>SD</i>	1	2	3	4	5	6
性別	—	—	1					
年齡	11.11	1.46	0.00	1				
家庭關懷度	7.08	2.77	-0.11 [*]	-0.08	1			
社交焦慮	5.14	4.53	0.24 ^{**}	0.08	-0.37 ^{**}	1		
心理彈性	92.24	17.91	-0.07	-0.07	0.57 ^{**}	-0.47 ^{**}	1	
校園欺凌受害	17.26	6.30	-0.01	-0.07	-0.28 ^{**}	0.48 ^{**}	-0.39 ^{**}	1

注：* $p<0.05$ ，** $p<0.01$ ，下同。

3.3 鏈式中介效應檢驗

使用海斯（Hayes，2013）提供的SPSS宏程序PROCESS中的模型6，在抽樣5000次和控制性別、年齡的基礎上，以家庭關懷度為自變量，社交焦慮、心理彈性作為中介變量、校園欺凌受害為因變量進行分析。回歸

分析結果顯示，家庭關懷度對校園欺凌受害的預測作用不顯著，但顯著負向預測社交焦慮，顯著正向預測心理彈性。社交焦慮顯著負向預測心理彈性，顯著正向預測校園欺凌受害。此外，心理彈性顯著負向預測校園欺凌受害，如表2所示。

表 2 變量關係的回歸分析

Table 2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study variables

變量	社交焦慮		心理彈性		校園欺凌受害	
	β	<i>t</i>	β	<i>t</i>	β	<i>t</i>
家庭關懷度	-0.35	-8.79 ^{**}	0.46	12.74 ^{**}	-0.04	-0.91
社交焦慮			-0.31	-8.29 ^{**}	0.42	9.67 ^{**}
心理彈性					-0.19	-4.07 ^{**}
R^2	0.18		0.40		0.30	
<i>F</i>	39.47 ^{**}		89.82 ^{**}		44.59 ^{**}	

採用偏差校正非參數百分位Bootstrap檢驗中介效應的顯著性，計算95%的置信區間，若置信區間不包含0則表示中介效應顯著（Ereceg-Hurn D M & Mirosevich V M，2008）。結果如表3所示，家庭關懷度→社交焦慮→校園欺凌受害、家庭關懷度→心理彈性→校園欺凌受害、家

庭關懷度→社交焦慮→心理彈性→校園欺凌受害這三條路徑的95%置信區間均不包含0，即社交焦慮、心理彈性在家庭關懷度和校園欺凌受害間起獨立中介作用，社交焦慮與心理彈性在家庭關懷度和校園欺凌受害間起鏈式中介作用。

表 3 基于Bootstrap法的中介效应检验

Table 3 Bootstrap-based test of mediation effects

路径关系	中介效应值	Boot SE	95% 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总间接效应值	-0.5785	0.0753	-0.7324	-0.4352
家庭关怀度→社交焦虑→校园欺凌受害	-0.3290	0.0569	-0.4457	-0.2211
家庭关怀度→心理弹性→校园欺凌受害	-0.2025	0.0456	-0.2966	-0.1188
家庭关怀度→社交焦虑→心理弹性→校园欺凌受害	-0.0470	0.0131	-0.0765	-0.0245

注：虚线表示不显著的路径，所有路径均为标准化的路径回归系数；出于简洁目的，图中未显示控制变量对主要变量的路径系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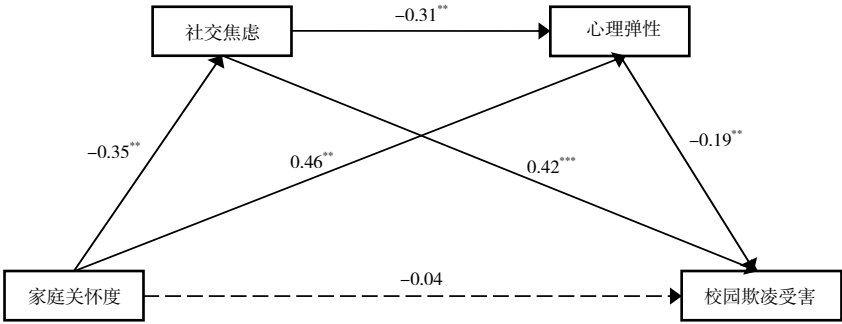


图 1 家庭关怀度影响中学生校园欺凌受害的链式中介模型

Figure 1 Chain mediation model of family care and school bullying victimization

4 讨论

4.1 家庭关怀度与中小學生校園欺凌受害的關係

本研究基于生态系统理论视角，探讨了家庭关怀度与校园欺凌受害的关系及内部作用机制。根据相关分析，家庭关怀度显著负向预测中小學生校園欺凌受害，即个体感知到的家庭关怀越多，其校園欺凌受害经历越少。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罗怡，刘长海，2016；Liu W & Guo Z，2024），进一步验证了家庭在个体社会适应与心理健康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一方面，高关怀家庭有助于儿童形成关爱他人、尊重差异的积极人格特质，从根源上抑制欺凌倾向（沈辉香 等，2021）。另一方面，良好的家庭情感支持可培养中小學生的同理心和亲社会行为倾向。家庭关怀在日常互动中潜移默化地塑造中小學生的情绪调节与自我控制能力，使其在遭遇校园冲突或排斥时，更倾向于采取理性、建设性的应对方式（Liu W & Guo Z，2024；Cho S et al.，2017）。此外，家庭关怀度对中小學生校園欺凌受害的直接效应不显著，而是通过社交焦虑、心理弹性间接对校園欺凌受害产生影响。这提示我们：单一家庭变量对欺凌受害的直接预测能力相对有限，在对中小學生校園欺凌的实际干预中，不能仅仅依赖家庭因素本身，而需要重视其内部心理机制的塑造作用。

4.2 社交焦虑与心理弹性的单独中介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家庭关怀度能通过社交焦虑的单独中介作用对中小學生欺凌受害产生影响。中小學生感知到的家庭关怀度越高，其社交焦虑越低，从而有更少的校園欺凌受害行为。该结果与以往以中小學生为被试所得的研究结果一致（王凤霞，2024）。

依据社会化理论，高功能家庭能使青少年发展出安全的社会倾向，反之，低响应性和隔离性的家庭功能会使青少年产生较高的社交焦虑（Okorodudu G N，2010）。此外，较低的家庭关怀度可能使个体在成长过程中形成不安全的依恋模式，缺乏来自父母的情感支持与积极反馈，进而在社交中表现出紧张、回避与过度警觉等特征（何玉琼 等，2018）。社交焦虑个体往往在人际互动中难以建立稳定信任关系，表达受限、自我评价偏低，更易被视为欺凌对象（王凤霞，2024；张珊珊 等，2021）。这也提示我们，家庭教育和心理干预应关注儿童社交情绪的培育，通过增强社交技能训练，缓解社交焦虑水平，进而降低其在校園中欺凌受害的风险。

研究发现，心理弹性在家庭关怀度和校園欺凌受害之间同样具有显著中介作用。这与已有研究结果一致，较高的家庭关怀度有助于提高中小學生的心理弹性，从而帮助其更少的卷入到校園欺凌受害中（马小红，2024）。心理弹性是一种通过与外部环境，特别是家庭系统的持续互动而逐步建构的心理资源。积极的家庭支

持，如情感回應、價值肯定和親密互動，被廣泛認為是增強個體心理彈性的關鍵因素（Masten A S, 2018）。相關研究也表明，即便處於不利教養環境中，若個體具備較高的心理彈性，其校園欺凌受害的負面影響亦可得到緩衝（Mesman E et al., 2021）。因此，家庭不僅是心理彈性的孕育場所，也是提升青少年應對校園風險能力的關鍵路徑。

4.3 社交焦慮和心理彈性的鏈式中介作用

本研究的結果還表明社交焦慮和心理彈性在家庭關懷度和校園欺凌受害之間起鏈式中介作用，即家庭關懷度通過社交焦慮影響心理彈性，進而影響中小學生校園欺凌受害。父母在家庭中過多表達忽視、拒絕、過度干預等消極養育行為，個體更容易形成不安全型依戀，對人際感到焦慮、不信任，害怕被拋棄或拒絕，而這種人際交往模式的不安全感會泛化到其他社交場景中，出現社交焦慮等現象（Georgiou S N et al., 2017）。同時，高社交焦慮的個體長期處於對社交情境的“高度警覺”狀態，需要耗費大量認知資源和情緒資源以應對想象中的威脅，降低自我效能感和掌控感，使個體在實際風險應對中表現出低水平心理彈性，無法以更積極的心態、更靈活的方式應對（Van Heugten K, 2013）。當保護性因素無法抵禦危險性因素的衝擊，個體更容易採取危險行為來應對風險情境，可能更容易產生校園欺凌行為（Cohen E et al., 2021）。因此，這一鏈式中介的驗證，不僅強調了家庭關懷在情緒與適應性心理發展中的重要作用，也為校園欺凌防治工作提供了干預思路：學校和家庭應協力關注學生社交情緒狀態，強化心理彈性教育，從源頭上減緩校園欺凌問題的发生。

5 本研究的價值與不足

本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首先，研究樣本僅來源於兩個城市，樣本地域覆蓋有限，且總體樣本量相對較小，可能影響結果的外部效度。未來研究可擴大樣本規模，並引入更具地域多樣性的樣本，以提升研究的普遍性與推廣性。其次，本研究僅採用橫斷面設計，變量數據均來源於被試的主觀自評，雖然能較好反映個體內在感受，但亦可能受到社會期望效應或記憶偏差的干擾，影響數據的客觀性和因果推斷力。後續研究可結合多時間點追蹤設計與多主體測量，以增強研究的因果推理與數據信度。

參考文獻

- [1] Smith, P. K., & Myron-Wilson, R. (1998). Parenting and school bullying. *Clinical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3(3), 405–417.
- [2] Attawell, K. (2019). *Behind the numbers: Ending school violence and bullying*.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 [3] 唐程夢, 蔣建軍, 彭偉, 等. (2022). 西部地區不同民族青少年校園欺凌與抑郁症狀的關聯. *中國學校衛生*, 43(10), 1467–1471.
- [4] 王武寬, 王晶, 冶夢楠, 等. (2021). 南昌市城市青少年校園欺凌狀況及與抑郁的關聯性分析. *現代預防醫學*, 48(16), 2933–2937.
- [5] Chai, L., Xue, J., & Han, Z. (2020). School bullying victimization and self-rated health and life satisfaction: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relationships with parents, teachers, and peers.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 (117), 105281.
- [6] Gini, G., & Pozzoli, T. (2013). Bullied children and psychosomatic problems: A meta-analysis. *Pediatrics*, 132(4), 720–729.
- [7] Copeland, W. E., Wolke, D., Angold, A., et al. (2013). Adult psychiatric outcomes of bullying and being bullied by peers in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 *JAMA Psychiatry*, 70(4), 419–426.
- [8] Menesini, E., & Salmivalli, C. (2017). Bullying in schools: the state of knowledge and effective interventions. *Psychology, Health & Medicine*, 22(Sup1), 240–253.
- [9] 郝文彬, 吳柯, 權菊青, 等. (2022). 中小學生心理問題與欺凌他人行為的相關性. *中國學校衛生*, 43(2), 225–228.
- [10] Beavers, W. R., & Voeller, M. N. (1983). Family models: Comparing and contrasting the Olson circumplex model with the Beavers systems model. *Family Process*, 22(1), 85–97.
- [11] Wu, K., Wang, F., Wang, W., et al. (2022). Parents' education anxiety and children's academic burnout: The role of parental burnout and family function.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2), 764824.
- [12] 潘蘭, 王滔. (2025). 殘疾公眾污名的代際傳遞: 對話定向溝通模式的中介作用和家庭關懷度的調節作用. *中國臨床心理學雜誌*, 33(1), 8–13.
- [13] Ma, X., Yao, Y., & Zhao, X. (2013). Prevalence of behavioral problems and related family functioning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an eastern city of China. *Asia-Pacific Psychiatry*, 5(1), E1–E8.
- [14] 林進材. (2017). 校園欺凌行為的類型與形成及因應策略之探析. *湖南師範大學教育科學學報*, 16(1), 1–6.
- [15] Schlenker, B. R., & Leary, M. R. (1982). Social anxiety and self-presentation: A conceptualization model. *Psychological Bulletin*, 92(3), 641.
- [16] 侯娟, 朱英格, 方曉義. (2021). 手機成癮與抑郁: 社交焦慮和負性情緒信息注意偏向的多重中介作用. *心理學報*, 53(4), 362–373.
- [17] Rodebaugh, T. L., Lim, M. H., Shumaker, E. A., et al. (2015). Social anxiety and friendship quality over time. *Cognitive Behaviour Therapy*, 44(6), 502–511.

- [18] 黃雪梅, 汪勇. (2006). 大學新生社交焦慮狀況與父母養育方式、人格的相關性研究. *中國健康心理學雜誌*, (2), 222–224.
- [19] 李潔, 張樂君, 溫兆仇, 等. (2021). 父母心理控制對流動兒童社交焦慮的影響：自尊和無法忍受不確定性的鏈式中介作用. *中國臨床心理學雜誌*, 29(1), 139–143+103.
- [20] 彭玉佳, 王愉茜, 鞠芊芊, 等. (2025). 貝葉斯框架下社交焦慮的社會認知特性. *心理科學進展*, 1–8.
- [21] Herrman, H., Stewart, D. E., Diaz-Granados, N., et al. (2011). What is resilience?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56(5), 258–265.
- [22] Cohen, S., & Wills, T. A. (1985). Stress, social support, and the buffering hypothesi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98(2), 310.
- [23] 席居哲, 曾也恬, 左志宏. (2015). 中國心理彈性思想探源. *中國臨床心理學雜誌*, 23(3), 555–559.
- [24] 張家銘. (2024). 大學生心理特質與校園欺凌感知的關係研究. *湖南師範大學教育科學學報*, 23(2), 117–123.
- [25] 游雅媛, 葉寶娟, 唐日新, 等. (2017). 家庭功能對中學生自殺意念的影響：有調節的中介效應. *中國臨床心理學雜誌*, 25(6), 1101–1103+1068.
- [26] 李海奎, 張文新. (2006). 心理韌性研究綜述. *山東師範大學學報 (人文社會科學版)*, (3), 149–152.
- [27] Kumpfer, K. L. (1999). Factors and processes contributing to resilience: The resilience framework. In *Resilience and development: Positive life adaptations* (pp. 179–224). Springer.
- [28] 范春艷, 汪泉. (2024). 初中生社交焦慮對手機成癮的影響：心理彈性的中介作用. *心理月刊*, 19(11), 75–77, 81.
- [29] 謝家樹, 魏宇民, Bear, G. (2018). 特拉華欺凌受害量表 (學生卷) 中文版再修訂及初步應用. *中國臨床心理學雜誌*, 26(2), 259–263.
- [30] Bear, G. G., Gaskins, C., Blank, J., et al. (2011). Delaware School Climate Survey—Student: Its factor structure, concurrent validity, and reliability. *Journal of School Psychology*, 49(2), 157–174.
- [31] 張作記. (2005). *行為醫學量表手冊*. 中華醫學電子音像出版社.
- [32] La Greca, A. M., Dandes, S. K., Wick, P., et al. (1988).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 Anxiety Scale for Children: Reliability and concurrent validity. *Journal of Clinical Child Psychology*, 17(1), 84–91.
- [33] 胡月琴, 甘怡群. (2008). 青少年心理韌性量表的編制和效度驗證. *心理學報*, (8), 902–912.
- [34] 熊紅星, 張璟, 葉寶娟, 等. (2012). 共同方法變異的影響及其統計控制途徑的模型分析. *心理科學進展*, 20(5), 757–769.
- [35] Erceg-Hurn, D. M., & Miroseovich, V. M. (2008). Modern robust statistical methods: an easy way to maximize the accuracy and power of your research. *American Psychologist*, 63(7), 591.
- [36] 羅怡, 劉長海. (2016). 校園欺凌行為動因的匱乏視角及其啟示. *教育科學研究*, (2), 29–33.
- [37] Liu, W., & Guo, Z. (2024). Influence of campus exclusion on bullying behavior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role of callous-unemotional traits and family caring. *BMC Psychology*, 12(1), 640.
- [38] 沈輝香, 戚務念, 范遠波. (2021). 校園欺凌防治的家庭關懷建構. *當代教育科學*, (8), 62–68.
- [39] Cho, S., Hong, J. S., Sterzing, P. R., et al. (2017). Parental attachment and bullying in South Korean adolescents: Mediating effects of low self-control, deviant peer associations, and delinquency. *Crime & Delinquency*, 63(9), 1168–1188.
- [40] 王鳳霞. (2024). *初中生受欺負與社交焦慮的關係：情緒調節自我效能感和師生關係的作用* (博士學位論文).
- [41] Okorodudu, G. N. (2010). Influence of parenting styles on adolescent delinquency in delta central senatorial district. *Edo Journal of Counselling*, 3(1), 58–86.
- [42] 何玉琮, 劉劍波, 肖博, 等. (2018). 大學生兒童期創傷及欺負/被欺負對安全感的影响. *中國學校衛生*, 39(5), 772–775.
- [43] 張珊珊, 張野, 申婷. (2021). 暴力暴露對校園欺凌的影響——社交焦慮的中介作用與自我控制的調節作用. *衛生研究*, 50(4), 539–546.
- [44] 馬小紅. (2024). *父母教養方式對中小學生校園欺凌的影响* (博士學位論文).
- [45] Masten, A. S. (2018). Resilience theory and research on children and families: Past, present, and promise. *Journal of Family Theory & Review*, 10(1), 12–31.
- [46] Mesman, E., Vreeker, A., & Hillegers, M. (2021). Resilience and mental health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n update of the recent literature and future directions.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iatry*, 34(6), 586–592.
- [47] Georgiou, S. N., Ioannou, M., & Stavrinides, P. (2017). Parenting styles and bullying at school: The mediating role of locus of contro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hool & Educational Psychology*, 5(4), 226–242.
- [48] Van Heugten, K. (2013). Resilience as an underexplored outcome of workplace bullying.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23(3), 291–301.
- [49] Cohen, E., Eshel, Y., Kimhi, S., et al. (2021). Individual resilience: A major protective factor in peer bullying and victimization of elementary school children in Israel.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36(19/20), 8939–8959.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Care and School Bullying Victimization among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The Chain Mediating Role of Social Anxiety and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Jiang Yidan¹ Wang Jingyi¹ Zhang Li²

1.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2. Changde Wuling No. 6 Primary School, Changde

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care and bullying victimization among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with a focus on the mediating roles of social anxiety and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A total of 546 students from Hunan Province participated in the survey, completing the Family Care Index Scale, the Delaware Bullying Victimization Scale (Student Version), the Children's Social Anxiety Scale, and the Adolescent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Scale. The findings revealed that: (1) Family care, social anxiety,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and bullying victimization were all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and family care significantly and negatively predicted bullying victimization; (2) Social anxiety and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served as significant mediators in this relationship, with three distinct pathways identified: the independent mediation of social anxiety, the independent mediation of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and the sequential chain mediation of social anxiety and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These results extend current understanding of the mechanisms linking family care to bullying victimization and offer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developing targeted interventions to prevent bullying in school settings.

Key words: Bullying victimization; Family care; Social anxiety;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